



生态翻译学及其 应用研究


韩竹林 果笑非 编著



HEUP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生态翻译学及其应用研究

韩竹林 果笑非 编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概述生态翻译学理论问题的同时,将其与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和翻译生态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以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发展为主线,重点梳理生态翻译学在公示语翻译、广告语翻译、企业宣传翻译、旅游宣传翻译、高校简介翻译、电影片名翻译、诗歌翻译和新闻翻译八个翻译实践领域的指导与应用,从而进一步解读生态翻译学的主张与优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翻译学及其应用研究/韩竹林,果笑非编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661-1088-6

I. ①生… II. ①韩… ②果… III. ①翻译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8501 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82519328
传 真 0451-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 168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heupress@hrbeu.edu.cn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生态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12534105)阶段性成果。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比较研究”(12542075)阶段性成果。

前 言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总结发展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生态学途径的全新翻译理论，亦或是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与以往翻译理论有所不同，生态翻译学具有浓厚的跨学科性质，其哲学基石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汰弱留强”以及“适应/选择”学说，关注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即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事后追惩。它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而且为一些难以解释的翻译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译者为中心，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原则、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诠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是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的转换，译评标准主要取决于多维度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整体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为最佳翻译。

本书在概述生态翻译学理论问题的同时，将其与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和翻译生态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以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发展为主线，重点梳理生态翻译学在公示语翻译、广告语翻译、企业宣传翻译、旅游宣传翻译、高校简介翻译、电影

片名翻译、诗歌翻译和新闻翻译八个翻译实践领域的指导与应用，从而进一步解读生态翻译学的主张与优势。

本书由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韩竹林和哈尔滨商业大学教师果笑非共同编著。具体分工如下：韩竹林负责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撰写，约10万字，同时为本书进行统稿；果笑非负责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三章的撰写，约10万字。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借鉴和引用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疏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生态翻译学概论	1
第二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	17
第三章 生态翻译学与关联理论比较研究	36
第四章 生态翻译学与功能对等理论比较研究	47
第五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公示语翻译	65
第六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广告语翻译	82
第七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企业宣传翻译	102
第八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旅游宣传翻译	119
第九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高校简介翻译	139
第十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电影片名翻译	153
第十一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诗歌翻译	173
第十二章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新闻翻译	190
第十三章 论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研究对象、 方法和走向	215
参考文献	225

第一章

生态翻译学概论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始于 2001 年, 是由中国学者胡庚申首次提出并自主研究创建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或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观, 或者说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 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性翻译理论研究。“生态”原指生物存在的状态, 现指世界万物和谐相处的状态。“生态学”则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翻译研究者从生态学研究中获得启发, 把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借用到翻译研究中来, 取生态之要义, 喻翻译之整体, 强调翻译适应选择, 用生态学术语来隐喻类比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 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 解读翻译过程, 描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和翻译能力发展。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

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动的整体。生态翻译学关注译者与翻译相关环境中诸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试图以新的理论视角对翻译的根本性问题，如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描述和解释。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下，生态翻译学着重强调译者为中心，强调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选择的过程。

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系统而有力的论述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翻译学者的荒地，究其原因不过是我们缺乏自主的、创新的、具有活力的话语系统。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译介”和“转述”的层面上，中国需要拥有原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且能够“走出去”的话语系统。生态翻译研究源自东方，有效地补充和丰富了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在生态翻译学创立与发展的十多年中，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围绕生态翻译的学术活动逐渐展开。

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认识到生态发展的重要性，生态与环境问题逐渐受到了重视，于是在思想界和哲学界就出现了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观的转变。在全球生态化背景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E. Haugen 于 1971 年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概念，他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1973 年，挪威著名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将生态学拓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1987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在其召开的环境会议上又发布了《人类共同的未来》。1990 年，M. Halliday 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告诫语言学家不可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

1995年，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提出了“生态存在”的理念，生态存在论哲学从此诞生。在这种哲学转向的引领下，各学科也纷纷与生态交叉衔接，具有生态学属性的各类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生态语言学、生态哲学、生态批评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等，都为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是由生态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研究领域。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生态和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主张将语言系统复归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观，思考语言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生态语言学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一个研究范式。在此浪潮的驱使下，从事翻译研究的部分学者和专家也开始从生态的视角关注和审视翻译活动，生态翻译学得以产生并自此长足发展。

达尔文的自然法则和适者生存理论的生物进化论，为生态翻译学既提供了哲学基础也提供了理论基础。生态翻译学理论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生态环境就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结构变化，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时至今日，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应运而生。学者们强调指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从根本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全球各国通过翻译

进行交流的同时，人类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生态环境归根到底就是“自然选择”，即生命体要“适应”自然环境、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当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就会发现不仅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而且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翻译的过程可以作如下解读：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是翻译影响环境，与此同时，翻译也同样受到人、社会、历史、地理、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会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中国紧随世界发展的脚步，也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这一概念被各方引用、强调和研究，包括翻译学。译者是读者与“译文和原文”两个不同世界的协调者。因此，生态翻译学理论被认为是译文与原文的最佳协调范式。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必须兼顾两头，瞻前顾后，既进入作者的创

作活动，又进入读者的阅读过程；既要了解作者又要了解读者；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为生态翻译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由中国学者发起的生态翻译学范式翻译研究，是与古代中国的“厚生惟和”的生态大智慧密切相连的。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中庸”“人本”“天下大同”等思想，就是该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以“道”为思想学说的道家 and 以“仁”为基本道德观的儒家思想都有所反映。道家中的“道”则是“道生万物”，“道”是世上所有物质和变化的法则，统治世上一切的变化和生命。道家思想是宇宙论和生命论的学说，具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特点。道教的创始人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辅相成，如，兴旺与衰亡、有为与无为、成功与失败、喧嚣与宁静。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在儒家思想中，“仁”涵盖了仁爱心、同情、慈善、人性和善良，“仁”是人性的几何，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争取的品质，是不断追求道德完美的渴望。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自然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的生命、生意，这种生命、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宋、明的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床前草不除”。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生态意识，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

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当一些人急于从西方寻找思想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当有人任意贬低中国文化时，季羨林却一语惊人，21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一定会在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和谐，如今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谐文化的形成，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认同和向往。和谐文化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翻译有着不同的选择和要求。我国作为一个翻译大国，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更是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于丰富自身文化的重要性。翻译不仅是信息交流，也是文化交流，季羨林曾指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由儒家、道家、佛家所提倡的关于自然共存、和睦相处的古典生态概念，是翻译学研究的生态学范式的理论基础。

三、生态翻译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翻译学站在生态学的角度，从一个崭新的层面阐释了翻译活动，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读，由此，翻译活动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指导。社会的发展、学术的发展等，都与生态翻译学的前进方向息息相关。几百年来，人类从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逐步走向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生态翻译学恰恰反映了文明的进步。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达尔文的生态进化论的启发下，生态翻译学探讨了在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译者的适应行为和选择行为的关系和变化规律，从适

应与选择这一新的视角重新解释了翻译活动。

生态翻译学对于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明确体现了“译者中心”这一理念。“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通的整体。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从发展脉络来看，生态翻译学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基本原理和生态整体思想，首先构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而后发展成为现在的生态翻译学，其理论基础雄厚，论证严谨而充分。胡庚申在《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阐明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即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和事后惩罚。该九个焦点问题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范式是对某学科进行研究的途径，是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生态翻译学的范式是一种“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是运用人的生态理性并从生态学视角来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的方式。

第二，翻译是对语言进行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活动属于人类的活动，而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样便形成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在认知视野中的链条，即“关联序链”。“关联序链”体现了翻译活动和自然界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第三，生态理性是生态翻译学中的宏观指导原则。胡庚申教授将“生态理性”归结为：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所谓注重整体关联，就是在翻译中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所谓讲求动

态平衡，就是要重视翻译活动中各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所谓体现生态美学，就是在翻译中要重视追求美，要遵循审美原则；所谓关照“翻译群落”，就是指要关照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包括译者、读者、作者、资助者、出版者和评论者等；所谓提倡多样统一，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要将“多样统一”作为宏观指导思想。

第四，译有所为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时有自己的动机，如为求生或为弘志等；二是翻译有其功能，比如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动语言的创新等。

第五，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广义上说，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中所包括的各种因素均会影响译者的适应和选择。

第六，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必须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来完成，译者的翻译活动是在其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切“矛盾”中进行的。笔者认为，“译者中心”理论过分地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而忽视了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因此，“译者中心”能否作为生态翻译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似乎还有待商榷。

第七，适应/选择是生态翻译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对译文进行的选择。这样，翻译就是译者的适应和选择交替进行的过程。

第八，生态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的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译者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的指导下，相对地集中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选择与转换。“三维”转换主要应用于翻译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九，事后追惩是指对译者行为的要求。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但译后还要由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自然法则对其翻译的结果进行裁定，要对其中的“不适者”和“弱者”进行批评或淘汰。

生态翻译学提出了“适应”和“选择”的理念。该理论指出，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而译者应根据翻译的生态环境，以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作为理论指导，对译文进行定向选择。翻译生态指的是翻译产业中的各项环节，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营销者、译评人、疑问审查者和版权人，他们都是翻译生态中缺一不可的要素，相互制约而又相依而存，共生共荣。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取得成功，译者首先要适应翻译环境，并与翻译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和谐共生。否则，没有了翻译生态中各个主体的合作，翻译活动不会顺利有序地进行。翻译环境则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翻译身处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元，因此译者都需要适应相应环境，与其融合成一体。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和谐共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需要译者适应其动态性、层次性以及个体性等特性，根据文本所处翻译的生态环境，进行相应的翻译策略和译文选择，才能够进行有效成功的翻译，达到预期的翻译效果和目的，这样，才能让译者的翻译活动更加成功。

翻译已然不仅是把处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作品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也是从一个更高的基点上反映出源自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碰撞及东西方本土文化的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代表了从目的语文化向母语文化的渗透。从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角度讨论译者的翻译活动，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从以前纯粹的文本翻译的研究跳跃到外面的文本翻译，并在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开展对于翻译活动的研究，使读者意识到了翻译理念中所蕴含的各种翻译思维和精髓。生态翻译学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系统探讨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问题，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从语言维、文化维层面去理解原文的意思及文化内涵，还要从交际维层面正确领会原作者的主观意图及

对读者产生的客观效果。不仅要从语言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原文的意义与文化内涵，评估其客观效果，也要从交际层面正确认识创作者的中心思想与内涵和读者的认知能力。因此，在评估一部翻译作品时，我们不应该被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范式翻译理念所束缚，而应该在参照其历史因素的基础上深入调查其成因，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这样才能使英语的翻译变得更加多样化、合理化，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翻译产生兴趣。

生态翻译学认可语言的多样性，也认可各种语言在表达作用上的通性，即各种语言都可在本民族的文化下对同一事物做出类似的表达。在认可语言是共性的、可译的情况下，生态翻译要求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以确保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反对单一语言的强势，反对语言的生态失衡。生态翻译就是要保持语言地位及文化交流的平衡。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进行无障碍交流，减少语言转换中的误差是“功能对等”理论和生态翻译理论的共同目的。

生态翻译理论力求在源语、译本和目标语之间达成和谐一致，构建和谐统一的生态翻译环境，从而体现出语言功能和谐统一的生态翻译思想。源语、译本和目标语之间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达到语言形式层面的和谐，还要达到语言内部功能的和谐。在方法上就是生态翻译语言的适应性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尽管不同文化下的语言形式各具特色，但语言功能都是同等或类似的，具有的表达力也是相同的。

在生态翻译学当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保证，但并未忽视翻译活动中其他因素的作用，对翻译活动各部分有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评价，减少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强化了其他翻译生态因素的地位。同时，该理论缩小了译者的主体作用的范围。译者只有在与原文作者、文本以及译文读者之间进